

## 游侠思想及背后司马光治国理政观念探究

 10.24412/2181-1784-2021-1-433-447

胡辰欣，兰州大学

**摘要：**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游侠。游侠是活跃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历史舞台的一个特殊阶层，侠文化也成为了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到了西汉时期，游侠群体便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史书记载中。据史书中有关游侠的记载可知，游侠思想在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游侠的看法更接近于班固的观点。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三本史书中有关游侠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对游侠形象进行还原，揭示司马光对游侠的态度和其他两者的相同或不同之处，同时深入考察其背后蕴含的原因，进而探究游侠思想背后司马光所持有的治国理政观念，以期对司马光复杂的政治思想有一个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史记》；《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游侠；治国理政思想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pre-Qin period, China already had rangers. Ranger is a special class active in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the knight culture has also become a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our countr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ranger group appear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in different images.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ranger in the history books,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ima Qian's "Historical Records" and Ban Gu's "Han Shu" in the ranger thoughts, while in "Zi Zhi Tong Jian", Sima Guang's view of rangers is closer to that of the ranger. Ban Gu's point of view.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store the image of the ranger to a certain extent by comparing the records of the ranger in the three historical books, revealing the similarities or differences between Sima Guang's attitude towards the ranger and the other two, and at the same time deeply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behind it. And then explore Sima Guang's concept of governance behind the ranger thought, in order to have a deep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ima Guang's complicated political thought.

**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Hanshu"; Sima Guang; "Zizhi Tongjian"; Ranger; State Administration Thought

前言

游侠是古代尚武任气的一支武者。关于西汉游侠的研究于二十世纪初开始兴起，一百多年来，学界对游侠的研究持续不断。有对游侠进行综合研究的大量专著。崔向东<sup>1</sup>一书以两汉游侠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游侠的由来、精神面貌、发展特点、生存状况等基本情况。梁启超<sup>2</sup>在其书中对春秋至西汉年间的 71 名侠士进行统筹评述。刘若愚<sup>3</sup>分析了游侠与诸子百家的异同，同时探析对中国游侠兴衰原因。陶希圣<sup>4</sup>对游侠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形成原因进行了探究。韩云波<sup>5</sup>对中国侠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王齐<sup>6</sup>对游侠进行分类，并对其产生、定义和精神特征等内容展开论述。李良臣<sup>7</sup>则从游侠的由来、西汉社会对游侠的应对、游侠的影响和转型这三个方面对汉代游侠展开论述。有对游侠的起源与兴衰进行专门研究。章太炎<sup>8</sup>认为孔子是游侠之首。汪聚应<sup>9</sup>则指出游侠应起源于先秦时期失败的纵横家。而劳榘<sup>10</sup>认为平民是游侠的来源。陈夫龙<sup>11</sup>在其论文中统计得出侠有七种起源。瞿同祖<sup>12</sup>提出游侠实则源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感召。顾颉刚<sup>13</sup>认为游侠大体来源于士阶层，这也是当今被普遍认同的说法。郝琳杰<sup>14</sup>指出，游侠群体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化而日渐衰落，在“大一统”的家产官僚制国家中被裁抑禁止是它的必然命运。有以游侠的文化、品质以及精神内涵为视角进行研究。王立在<sup>15</sup>其论文中着重描绘了游侠精神内涵中的滥杀性、虚伪性等特点。韩云波<sup>16</sup>指出，游侠不仅具有反抗精神，也有对自由理想的追求，自由与正义是游侠这一群体的特质所在。潘琦<sup>17</sup>对侠义精神对中国法治意识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究。李婧瑶<sup>18</sup>则以儒释侠，认为西汉游侠多处体现了儒

<sup>1</sup> 崔向东著：《汉代豪族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3年，第223页。

<sup>2</sup> [清]梁启超著：《中国之武士道》，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86页。

<sup>3</sup> 刘若愚著：《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1页。

<sup>4</sup> 陶希圣著：《辩士与游侠》，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74页。

<sup>5</sup> 韩云波著：《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113-122页。

<sup>6</sup> 王齐著：《中国古代的游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9-82页。

<sup>7</sup> 李良臣：《西汉游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20年。

<sup>8</sup> [清]章太炎著：《馗书》，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第17-19页。

<sup>9</sup> 汪聚应：《唐代侠风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第37页。

<sup>10</sup> 劳榘：《论汉代的游侠》，《文史哲学报》1950年第1期，第241页。

<sup>11</sup> 陈夫龙：《侠的起源诸学说批评》，《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3-47页。

<sup>12</sup> 瞿同祖著：《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

<sup>13</sup> 顾颉刚著：《史林杂识初编》，《武士与文士之转变》，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1页。

<sup>14</sup> 郝琳杰：《游侠兴衰与儒家思想正统化的关系探析》，《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2019年第1期，第1页。

<sup>15</sup> 王立：《侠的负面与慕侠社会心理之失——中国古代侠文学主题片论》，《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第11-12页。

<sup>16</sup> 韩云波：《中国民间文化中的游侠精神》，《新东方》1995年第6期，第50页。

<sup>17</sup> 潘琦：《中国侠义精神与法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3卷，第186-187页。

<sup>18</sup> 李婧瑶：《游侠的两张面孔——读〈史记·游侠列传〉》，《读写月报》2021年第22期，第52-54页。

者的品质。王振兴<sup>19</sup>指出秦汉之际游侠具有“不重出身、推重能者”，借婚姻而依托富家的婚姻观念。贾立国<sup>20</sup>则提出侠文化的来源，它是社会上层与下层文化交融的产物等等。有对汉代个体游侠进行研究。赵雅茹<sup>21</sup>对《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的游侠郭解的性格特征进行细致分析。冯军<sup>22</sup>则对郭解的成名原因、交游、死亡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考证。也有对现代意义的追加。金小鸥<sup>23</sup>在其论文中对古代侠士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进行客观分析，指出侠士文化的精神内核能契合与补充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汉书》的部分篇章承袭《史记》，但这两本史学著作在游侠思想上存在着较大差异。目前学界对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版本《游侠传》的对比研究，以及背后意图的考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陶嘉伟<sup>24</sup>还原《史记》和《汉书》中的游侠特征并作比较。黄美玲<sup>25</sup>从“侠的定义”角度切入，对马班游侠观的差异之因进行探究。张光全<sup>26</sup>在其论文中指出，两人学术背景、思想倾向的差异，以及东汉和西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产生差异重要原因，付昀夕<sup>27</sup>与朱萍<sup>28</sup>也认可这种观点。刘秀敏与彭薇<sup>29</sup>认为，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表现在作者立传目的不同，以及游侠的定义、地位作用、精神内涵的差异等多方面。著者的个性品格、生活经历、家庭背景也能影响他们的史学观。岳岭<sup>30</sup>在其论文中指出，两者对游侠记述不同的原因不仅在于游侠自身有正义性和破坏性两种相对的特征，还与司马迁、班固的伦理观和看待问题的角度密切相关。

综观近 40 年来国内的研究成果可知，关于游侠问题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史记》和《汉书》中的游侠及其思想进行研究，重在分析两者所反映的游侠思想的异同以及背后蕴含的原因，并未涉及《资治通鉴》中有关游侠的记述。通过研究发现，在《资治通鉴》

<sup>19</sup> 王振兴：《论秦汉之际游侠群体的婚姻观念》，《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1期，第49-54页。

<sup>20</sup> 贾立国：《“中国侠文化属于平民文化”说质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63页。

<sup>21</sup> 赵雅茹：《从〈史记·游侠列传〉看布衣之侠郭解的性格特征》，《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0年第29期，第104-106页。

<sup>22</sup> 冯军：《汉代游侠郭解事迹考证》，《兰台世界》2012年第21期，第71-72页。

<sup>23</sup> 金小鸥：《从游侠列传的前后比较中探讨侠士文化的流变及其当代价值》，《戏剧之家》2021年第10期，第177-179页。

<sup>24</sup> 陶嘉伟：《试析史书中的游侠形象——以〈史记〉〈汉书〉游侠列传为例》，《科教导刊(中旬刊)》2020年第32期，第37-38页。

<sup>25</sup> 黄美玲：《对马班游侠观的再认识》，《考试周刊》2011年第36期，第30-31页。

<sup>26</sup> 张光全：《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第95-100页。

<sup>27</sup> 付昀夕：《浅析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的差别及其原因——以〈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为例》，《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3期，第36-40页。

<sup>28</sup> 朱萍：《司马迁、班固与游侠》，《安徽文学》2006年第8期，第56-59页。

<sup>29</sup> 刘秀敏，彭薇：《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文教资料》2011年第19期，第103-104页。

<sup>30</sup> 岳岭：《〈史记·游侠列传〉与〈汉书·游侠传〉之异辨——兼论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家主体意识》，《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6期，第8-10页。

中，司马光对游侠的看法接近于班固的观点，而与司马迁的思想相悖。因此，本文重在探究司马光对游侠的态度和其他两者的区别，结合司马光的生平经历、家族文化、政治观念、学术背景、思想倾向、所处的时代背景等因素深入考察其背后蕴含的原因。此外，司马光生于儒学快速发展的北宋，为了适应统治阶级重振纲常、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他将儒学思想作为其治国理政思想的来源，创立了颇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本文也力图从游侠思想的背后，深入挖掘司马光的礼法并用等治国理政观，以期为当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 游侠的兴起、发展和消亡

最初的游侠脱胎于战国时期的门客。他们出现于乱世，成长于纷争，在西汉初年达到鼎盛。侠的产生是在贵族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一种非制度化的分权，也是对日益发展的集权的一种抵制。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逐渐丧失，诸侯国陷入了彼此征伐、混乱无序的状态。奴隶制迅速瓦解，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确立并且进一步壮大。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各个阶层的统治者渴望称霸天下，纷纷招揽贤士，例如秦孝公为复穆公霸业而颁布求贤令。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自由流动且具有特殊技艺的“游士”，例如商鞅、吴起等人。为了一展宏图大志，有的布衣之士凭借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用作人主的说客与使者，或靠出众的武艺和勇力为人所驱使。<sup>31</sup>在他们之中，善文的为文士，善武的为武士，而这些武士最早便称为了游侠。养士之风的出现，为武侠这一群体的迅速壮大提供了内在的驱动力。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战国四大公子，他们以养“士”而著称。此外，大城市的崛起也为早期的游侠提供了聚集、交往、活动的中心。从此以后，游侠便成了具有坚守信念、崇尚自由、强大武力这一类人的统称。

游侠恣意妄为的做法让统治者颇为忌惮，在大一统时代，他们无疑会走向衰落。由于荆轲、张良等侠士刺杀嬴政的事件层出不穷，秦朝采用了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游侠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压制。汉代初年，统治者以黄老之学治国，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为主要政策，给游侠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很大的活动空间。不仅如此，汉代的建立者刘邦就是一位大豪侠，他将身边的游侠势力集中起来为自己效力，以更好地维持地方秩序。汉初前期，卿相诸侯仍然盛行养客之风，例如淮南王刘安、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等人门下常养宾客。养客之风有利于侠风的滋长，促进游侠数量的激增。在这一时期，游侠作为一种实体的民间力量而存在。到了汉武帝时期，皇权专制制度日渐完善。为了巩固大一统的王朝，汉武帝对游侠进行了严厉地打击与压制，采取强制迁徙的政策，甚至任用大批酷吏大力惩治游侠。<sup>32</sup>济南豪侠眭氏正是被景帝任用

<sup>31</sup> 李良臣：《西汉游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20年，第12页。

<sup>32</sup> 李良臣：《西汉游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20年，第12页。

的酷吏郅都所杀。在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这两个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时期，绿林赤眉与黄巾军起义使游侠势力得以短暂兴盛。

汉代之后，游侠这一群体并没有消亡，而是随着统治阶级控制力度的松弛或紧密在数量上发生变化。每到改朝换代时期，一大批游侠们重新出现，但到了国泰民安之时，他们又会销声匿迹，其灿烂光辉只不过是恰逢乱世的昙花一现。在这一过程中，侠文化得以诞生，它存在的意义，便是在统治者的高压统治下人性中所追求的自由。纵观此后几千年的历史，随着封建统治体系的日趋严密和皇权的不断强化，游侠作为社会的特殊人群，不得不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逐渐衰落。实体的游侠越来越少，唯有侠义精神作为一种社会风尚流传后世、永存不朽。

## 二、《史记》和《汉书》游侠思想的不同

不同于汉代以前的侠客，汉代游侠具备了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经济来源，这保证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出自个人的意愿，不再受到权贵的限制。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游侠的形象概括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戾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sup>33</sup>。在司马迁的笔下，游侠以信、义、功、贤为主要行为特征，他们的人格魅力在于信守诺言，给人带来道义上的拯救。尽管游侠的做法违背了当时的统治秩序，但其作为一个具有特殊行事风格的群体，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甚至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例如在吴楚七国之乱时，条侯为太尉，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sup>34</sup>。剧孟以“以任侠显诸侯”<sup>35</sup>，在国家内乱时有相当重要的作为。其品行亦为人所重，当母亲去世，剧孟“自远方送丧，盖千乘”<sup>36</sup>。鲁国的朱家是闻名于关东的侠义之士，“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鞦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sup>37</sup>、“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sup>38</sup>以及对季布将军施恩不图报等行为足以体现他生活朴素且助人有方的品质。符离人王孟因行侠而闻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对于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兒长卿，东阳的田君孺等人，司马迁称赞他们“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sup>39</sup>。此外，《游侠列传》中提到游侠郭解在汉武帝时期被逮捕法办的事：“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

<sup>33</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1页。

<sup>34</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4页。

<sup>35</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4页。

<sup>36</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4页。

<sup>37</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4页。

<sup>38</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4页。

<sup>39</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8页。

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sup>40</sup>郭解被诛本应理所当然，但相反，司马迁对郭解这样称赞：“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sup>41</sup>。不仅如此，当有人对郭解轻慢无礼时，他首先反思自身“修之不德”<sup>42</sup>，然后做到以德报怨。总的来说，司马迁对郭解的讲求信义、急人之难的侠义行为持有充分肯定的态度。

在《汉书·游侠传》的前半部分，班固主要记载的人物如朱家、剧孟、王孟、郭解等人与《史记》中的基本相同，此后他又记载了菑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物。班固对朱家、剧孟、王孟等人抱有的态度与司马迁一致，都以褒扬为主，班固曰：“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sup>43</sup>但对菑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虽然有涉及他们的侠义行为，但班固更侧重于展现他们犯法作奸、内隐好杀、嗜酒如命的特点。由于班固以儒家和统治阶层的视角记述游侠，所以他对郭解这一类人物毫无司马迁的赞赏之情，而是在文章开头就从正统思想的角度对其进行极力批判：“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sup>44</sup>本应由天子掌握的杀生之权落入了身为匹夫百姓的郭解手中，他“少时阴贼感概，不快意，所杀甚众。以躯借友报仇，臧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不可胜数”<sup>45</sup>的做法令人可憎可恨。在班固看来，郭解不顾国家法律与道德伦理，最终落得被汉武帝全家处斩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

班固与司马迁游侠思想的不同有多方面原因。第一，从学术背景的角度来看，司马迁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取道家黄老学说，因其多样的学术背景使他能够更好地接受与统治秩序相悖的游侠精神；班固出生于儒学世家，且生活在儒学被确立为正统思想的东汉时期，正统思想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班固以儒家和统治阶层的视角记述游侠也在情理之中。第二，从个人经历来看，《史记》与《汉书》记述思想上的不同更多地与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法律过分的残忍无情和人性的冷漠令他难以释怀，司马迁始终对君主专制有强烈的抵制情绪，将游侠视为对抗严苛封建统治的强大异质力量<sup>46</sup>。当他看到游侠被统治者无情打压迫害，甚至被世俗民众所取笑时，司马迁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影子，于是借游侠寄寓他的人格理想与是非观念；与司马迁不同，班固在受窦宪受株连之前却有相对稳定的写作环境，并无这种情感色彩

<sup>40</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8页。

<sup>41</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9页。

<sup>42</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6页。

<sup>43</sup>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99页。

<sup>44</sup>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99页。

<sup>45</sup>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01页。

<sup>46</sup> 陶嘉伟：《试析史书中的游侠形象——以〈史记〉〈汉书〉游侠列传为例》，《科教导刊(中旬刊)》2020年第32期，第38页。

左右。第三，从思想倾向来看，司马迁从 20 岁就开始游历全国，与民间的接触更多，更能体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生活，所以他着眼于游侠的正义性与合伦理性，对振人不赡、救人于厄的闾巷之侠充满好感；而班固出身于名门贵族，16 岁入洛阳太学，受正统思想的影响较大。他对《汉书》的撰写更注重上层，对尊汉、尊皇的倾向较多，所以班固以王法秩序的立场立论，着眼于游侠的非法性和破坏性。第四，从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来看，秦末汉初时期，游侠之风在社会大盛，且汉初统治者实行的黄老之学使这一社会势力更能自由发展。尽管游侠在汉武帝时期被打压，但未完全压制，处于西汉中期的司马迁仍能感受到游侠阶层的强大；而光武中兴以来，由于皇帝严格禁止朝臣交通游侠，导致任侠之风逐渐消退以至没落，生活在东汉初年的班固对游侠自然不会有太多好感。<sup>47</sup>

### 三、《汉书》与《资治通鉴》游侠思想的一致性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可以说是惜墨如金。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司马迁用了六卷来讲汉武帝在位时候发生的大事，平均一卷约为九年，九年之事总计一万多字。而司马光记述游侠郭解，却不惜笔墨撰写了一千多字。由此可知，司马光在游侠郭解身上倾注了很多个人情感，其背后也蕴含着一定的政治观念。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简短记述郭解的总体形象特征和最终结局后，大量引用了班固与荀悦对郭解的评价。司马光首先指出“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sup>48</sup>这种井然有序等级秩序的合理性，接着抨击“大夫世权，陪臣执命”<sup>49</sup>和战国四君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sup>50</sup>的无耻行径，同时坚决反对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sup>51</sup>此等权利滔天的社会现象。司马光与班固都强调封建法度，提出游侠最大的危害是“背公死党”<sup>52</sup>，破坏了“守职奉上之义”<sup>53</sup>。而游侠与诸侯结交，乃至手上掌握他人的生杀大权，是朝廷无威信可言，且社会丧失正常秩序的表现。他们都主张重建和维持严格的等级统治秩序，反对江湖规矩和国家法规之间形成对立与冲突。司马光也借荀悦之言

<sup>47</sup> 付昀夕：《浅析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的差别及其原因——以〈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为例》，《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3 期，第 39 页。

<sup>48</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06 页。

<sup>49</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06 页。

<sup>50</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06 页。

<sup>51</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06 页。

<sup>52</sup> 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丛论》，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28 页。

<sup>53</sup> 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丛论》，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28 页。

表达个人情感，指出游侠具有“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sup>54</sup>的行为特征，同意游侠、游说与游行是“德之贼也”<sup>55</sup>的观点。他指出，这三者必定会“伤道害德，败法惑世”<sup>56</sup>，是“乱之所由生也”<sup>57</sup>的原因之一。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背景。首先，北宋时期的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是司马光统治秩序思想产生的现实依据。<sup>58</sup>司马光处于积贫积弱、社会危机严重的时代。宋朝统治已近百年，政策的弊端渐渐显露。不仅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且冗费、冗兵、冗官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北宋重文轻武政策的实施也使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低下。社会危机的加重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北宋时期的社会秩序也变得混乱不堪。此外，宋政权北方金、夏、辽、蒙古国等少数民族国家政权的建立，西南和西北地区大理、回鹘、吐蕃等若干小国的出现<sup>59</sup>都制约着宋代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拥有高度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们纷纷想方设法解决国家的这些严峻问题，在探讨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学说，司马光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北宋社会革新和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士大夫复兴儒学、重建思想秩序的背景下，司马光的道德思想也得以发展起来，“仁”之道德和“礼”之伦理是他思想的核心所在。<sup>60</sup>此外，司马光思想的提出不仅源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与他少年时期随父游历、父辈对他的言传身教这一渊源深厚的家学传统有关。<sup>61</sup>司马光出身于谓当地诗礼传家的名门望族，该家族多以儒者自居，三代为官，他的父亲司马池以及祖父司马炫都因气节闻名于乡里。其父“读书研求精意，不喜肤末，为文根于正道，不为雕琢”<sup>62</sup>，其母“才淑之懿，孝睦之行著于闺门，而称于乡党”<sup>63</sup>。司马光幼时便受到家族思想的影响，笃诚好学，苦读诸经与注释。他从7岁就开始阅读《左氏春秋》，竟达到了“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寒渴暑”<sup>64</sup>的学习境界。在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司马光的思维方式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自称“世家

<sup>54</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页。

<sup>55</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页。

<sup>56</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页。

<sup>57</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页。

<sup>58</sup> 李风阳：《司马光的统治秩序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5年，第1页。

<sup>59</sup> 马加路：《司马光社会思想探析》，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9年，第12页。

<sup>60</sup> 张丽：《司马光道德思想的生成语境、特点和自我践行》，《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0页。

<sup>61</sup> 包米尔：《司马光哲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第15页。

<sup>62</sup> 首题：“宋天章阁制司马府君碑铭”，录文见庞籍著：《全宋文（第九册）》，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386页。

<sup>63</sup> 首题：“宋天章阁制司马府君碑铭”，录文见庞籍著：《全宋文（第九册）》，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387页。

<sup>64</sup> [元]脱脱著：《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757页。

相承、习尚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语言、父兄提携、授以经籍”<sup>65</sup>。因此，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司马光强调礼教治国的重要性，重在保证社会基层的构建合理有序，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 四、游侠思想背后司马光治国理政观念

司马光擅于利用《资治通鉴》诠释历史，从而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表达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前文中提到，司马光对剧孟、郭解等游侠的做法予以严厉批评，强调以礼治国的政治模式，同时推进法制，目的在于加强国家的控制力、稳定与调整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拥护政府权威体制。此外，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富国手段和宋神宗的强兵目的持激烈反对态度的最终目的也在于维持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总而言之，司马光治国理政的观念和具体措施都围绕着在皇权笼罩下建立体制化秩序这一共同目标展开。

#### 构建基本人伦关系

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sup>66</sup>，但人性本恶，很容易出现“争则乱，乱则穷”<sup>67</sup>的情形。所以，人类社会必须要“制礼义以分之”<sup>68</sup>。司马光推崇荀学，致力于继承和发扬荀子的礼学思想。<sup>69</sup>他非常重视“礼”的作用，把“礼”看做统治秩序的最高典范。司马光对礼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所起的作用多有论述，“不以礼节之，则贪淫侈溢而无穷也”<sup>70</sup>便是其一。“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想与戴君以治之”<sup>71</sup>，司马光指出，人能够得以生存和延续，关键在于确立基本稳定的人伦关系。圣人制礼的目的在于用礼来节制不同等级群体对财富、权势、名声等无限制的欲求，从而达到社会平衡。司马光还在其晚年未竟之作《潜虚》中对《体图》进行了很好的构建<sup>72</sup>，这也正反映了他的社会构成观。司马光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sup>73</sup>司马光始终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以德贯之。社会是由多样差异个体共同构成的，人类的合理存在必须靠尊卑有序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建立来实现。人人都要塑造个人行为规范，遵守社会合理秩序，形成一个完善的社会阶级伦理体系。若无

<sup>65</sup> [北宋]司马光著：《司马光集·谢校勘后》，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18页。

<sup>66</sup> [战国]荀况著：《荀子·富国篇第十》卷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sup>67</sup> [战国]荀况著：《荀子·礼论篇第十九》卷十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sup>68</sup> [战国]荀况著：《荀子·礼论篇第十九》卷十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sup>69</sup> 包米尔：《司马光哲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第15页。

<sup>70</sup> 马加路：《司马光社会思想探析》，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9年，第36页。

<sup>71</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魏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185页。

<sup>72</sup> 杨晓辰：《司马光道德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9年，第83页。

<sup>73</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76页。

伦理的束缚，人人都像郭解之类“睚眦杀人”<sup>74</sup>，基于私利行事，天下就会出现“天下以智力相雄长”<sup>75</sup>，甚至“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sup>76</sup>的混乱局面。针对宋人庶族阶层的崛起与僭礼越分之事时常发生的社会现象，司马光将施政重点放在建设民间礼制，积极推进“礼下庶人”来妥善管理这一阶层。同时，他也撰写了许多关于家礼的著作来具体规定庶人在民间的行为规范，进而维护封建礼治与社会秩序。

### 礼乐教化

礼除了能对臣民百姓进行强制约束之外，还有教化作用。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司马光就提出“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sup>77</sup>。他把礼治放在国家政治的首位，极力批判周天子认可三家分晋的做法，指出周朝秩序的崩溃在于未能维持政治权威的正确形式。司马光对倒叙法的使用，是为凸显以礼制为核心的秩序观，强调“礼”作为政纲的重要性。而三家分晋，秦朝灭亡等都是礼坏的结果。下文的“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sup>78</sup>是司马光最基本的政治思想的表达。五代十国时期更是礼崩乐坏，不仅藩镇跋扈、士卒骄横、下陵上替，而且社会伦理沦丧，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计其数。欧阳修也提到五代时期社会“人伦衰，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sup>79</sup>的情形。尽管宋建国后政治走向大一统，但违礼之事仍旧很难迅速改变。为了强化礼制建设，司马光提出“教化国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的观点。<sup>80</sup>在司马光看来，礼为纪纲，社会是国家的一部分，对社会的教化是决定政治成败、国家兴衰的关键<sup>81</sup>，这种观点也成为他对剧孟、郭解等游侠持反对态度的原因之一。司马光曾上书过的奏章“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sup>82</sup>也说明了这一点。他主张君王要以仁义礼信来治国治民，坚信只有让百姓同心同德，社会风气才能改变。在这里，司马光特别强调统治者要做到修心与道德至圣，充分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同时，司马光基于重建

<sup>74</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5页。

<sup>75</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魏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页。

<sup>76</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魏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页。

<sup>77</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周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页。

<sup>78</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页。

<sup>79</sup> [北宋]欧阳修著：《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85页。

<sup>80</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173页。

<sup>81</sup> 姜鹏：《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4页。

<sup>82</sup> [北宋]司马光撰：《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十，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296页。

社会秩序，有意识地加快儒学社会化的进程。他认为，儒学社会化可以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家规族法、通俗文学、祭祀活动、谕俗乡约等途径对士阶层乃至整个社会各个阶层进行渗透。<sup>83</sup>

而剧孟、郭解等游侠未经政府的教化，不受政府法令的约束，基于独立于政府法规之外的价值观、情理观行事。他们攻讦长吏、作奸犯科、擅作威福，利用威望和势力在地方上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民间秩序，这种行事手段无疑会破坏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等级秩序。针对游侠“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飧宴之好”<sup>84</sup>等僭礼越分的行径，司马光也借荀悦之言说明“正其制度”<sup>85</sup>与“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sup>86</sup>的重要性。总而言之，司马光极力主张教化应成为政府的施政先务和基本职能<sup>87</sup>，尤其是对剧孟、郭解之类目无尊法的游侠进行礼乐和道德上的教化，形成教化大行、根底深厚的社会氛围和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

### 尊君思想

司马光主张隆礼与尊君，这与他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sup>88</sup>，在司马光看来，君的产生是历史性的，应“治民”的社会需要而产生。君治理百姓的前提在于确立上下有别的尊卑关系，将君主意志通过公、侯、卿、大夫职能的实现渗透至社会各个阶层。而这需要通过礼教纲纪来维持，“礼”在实际上规定了一种“自天子、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伦”<sup>89</sup>的上下井然的政治等级结构，维护礼就是维护等级秩序。在这个结构中，一方面，“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sup>90</sup>，君主能对全国的政治事务进行很好的掌控；另一方面，“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sup>91</sup>，臣属士庶又能凭借这一结构维护统治者的权威，使

<sup>83</sup> 张丽：《司马光道德思想的生成语境、特点和自我践行》，《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3页。

<sup>84</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页。

<sup>85</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页。

<sup>86</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页。

<sup>87</sup> 姜鹏：《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4页。

<sup>88</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185页。

<sup>89</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魏纪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064页。

<sup>90</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页。

<sup>91</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页。

之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sup>92</sup>，君主对礼制的维护是他作为国家最高政治领袖的首要任务。此外，实行“礼治”的关键在于维护“名”，要保证君臣之界不逾矩。地位高的人应管辖地位低的人，地位低的人应顺从地位高的人。对于游侠这一群体而言，封建专制、皇权至尊的王朝容不下侠者人性光辉的张扬。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归顺，另一条则是灭亡。

游侠的“以武犯禁”对中央集权国家造成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部分游侠有着较强大的实力，易成为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例如，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数”<sup>93</sup>，有着雄厚的实力。济南豪侠闾氏有“宗人三百余家”<sup>94</sup>，且“二千石莫能制”<sup>95</sup>，实力竟强于地方官府。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sup>96</sup>，他们的势力能与公卿王侯相提并论甚至大大超越，可见民间势力严重威胁到礼制的基本法则和皇权的至高无上。其二，游侠势力不仅强，社会影响力还很大，无疑会动摇皇帝独尊和皇权至上的地位。当郭解被徙往茂陵时，“诸公送者出千余万”<sup>97</sup>，郭解入关时，“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sup>98</sup>。朱家享有很好的名声，“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sup>99</sup>。还有季布的弟弟季心为任侠时，“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sup>100</sup>。“众庶荣其名迹，覬而慕之”<sup>101</sup>，百姓不崇尚皇权，而是仰慕游侠的事迹。更有“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sup>102</sup>的社会现象。部分百姓不按道德规范行事，反而形成了一种以杀人为荣、名誉至上、按自身规则行使忠义的社会风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sup>103</sup>郭解仅为平民，家中贫困，却被汉武帝迁徙，还有汉武帝灭郭解等人全族的做法都表明了皇权至上，不容侵犯。其三，豪侠与达官显贵的结交，更是对皇权造成了削弱。有卫青为了郭解不徙往茂陵而向武帝求情，也有袁盎善待剧孟，夏侯婴为赦免季布而向高祖进言等等。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尊君”是上下有序、社会稳定的保证，所以司马光相当重视对君主权威相关礼制名位的维护。

<sup>92</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页。

<sup>93</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4页。

<sup>94</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33页。

<sup>95</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33页。

<sup>96</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6页。

<sup>97</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7页。

<sup>98</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4页。

<sup>99</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4页。

<sup>100</sup>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32页。

<sup>101</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6页。

<sup>102</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6页。

<sup>103</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6页。

## 养百姓

司马光反对战争，主张轻徭薄赋，这也是他推行礼治、施行仁政的一大表现。司马光一直批评宋神宗试图动用武力而用兵域外，因为这一做法很可能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进而引发国家动乱的局面。元丰五年，司马光在寓居洛阳时，作了一份遗表。在《遗表》中司马光曰：“臣所惜者，以陛下之圣明，不师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汉武之所为。借使能踰葱岭、绝大漠、麀皋兰、焚龙庭，又何足贵哉！”<sup>104</sup>他指出，发动战争只会劳民伤财、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也与他反对游侠这一类群体的出现有共通之处，游侠的声望与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在民间不顾法规、肆意活动与国家发动战争的后果一样，小至民间失序，大至政权颠覆，都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稳定。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在于他违背了中和的原则。变法不仅本身存在很大弊端，易被人利用，成为扰民害民、谋私敛利的工具，且新法具有极大的纰漏，会使广大劳苦人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例如，青苗法的施行导致政府为了还贷，只能逼迫农户和富户破产，而且政府强制借贷，利息高，加大农民负担。还有市易法和均输法的推行，官商得以实现对价格、货源、市场的彻底垄断，民商和百姓都成为了他们剥削的对象。方田均税法本是为了合理化征收税收，但官员却借机对劳苦人民进行增税。此外，保甲法看似能维护农村社会的治安稳定，但实际执行时，“上番”即强迫人们做义务劳动或是徭役，“教阅”也严重影响了保丁们的家庭农业生产，甚至还出现保长、团练等强行向保民征收税款的现象。保马法也对百姓百害而无一利。政府将土地作为牧地分给农民让其养马，不仅征收土地租金，养马有失还需农民赔偿。

司马光持有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当他看到百姓因赋税徭役过重而流转死亡，便对皇帝上《论劝农》奏，要求极力改善农民的处境。“兴教化”要以“养百姓”为前提，若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国家对百姓道德风俗的教化只是清谈。同时，“养百姓”才能“利万物”，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使之安居乐业，国家才能有充足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生产效率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 赏罚分明

司马光主张礼法并用之道，始终将赏罚之法视为政治之本。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提出“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sup>105</sup>、“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sup>106</sup>等观点。他还在奏章中多次提出统治者需要做到的三个致政之道，强调“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sup>107</sup>

<sup>104</sup> [北宋]司马光撰：《遗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85页。

<sup>105</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503页。

<sup>106</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晋纪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295页。

<sup>107</sup> [北宋]司马光撰：《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十，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297、298页。

的重要性。总的来说，司马光的赏罚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赏罚明当，二是赏罚必行。<sup>108</sup>

首先，司马光提出统治者必须任用士，选拔人才。接着，他指出了普遍政府现象，统治者的作用应是分配与监督官员，使政府中的官员各司其职。但事实情况却相反，政府对官员的委派和升迁仅由他们的资历决定，在官员还未了解工作之前，或当良好结果还未显现时，他们往往就被调离至其他职位。那些做出尝试的人往往遭到处罚，而逃避问题者则受到奖赏。所以，司马光将施政重点放在把每个人分配到适合他们能力的职位上，并运用正确奖惩的手段让官员履行应有的职责，使政府能够正常运转。与此同时，针对“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知匡改也”<sup>109</sup>揭示的周礼衰落，汉唐时期人们习惯挑战上级、无上下尊卑秩序，以及宋代谋杀尊长、殴打、为恶逆大罪案件时有发生等社会现象，司马光极力倡导政府官员应负有责任让百姓习惯于“上下之分”<sup>110</sup>，鼓励遵守社会规则的人，而惩罚那些偏离正道的人。他认为，秩序应依靠于维系一个明确界定的代表权威的阶层，只有让百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习惯于国家权力关系的等级之分，社会才能稳定，国家也能长治久安。

此外，司马光主张重刑主义，将礼与法这两种社会手段相结合，充分肯定政府官员对百姓有功必赏、有罪必诛的举措。他提出“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凡杀人者死，自有刑法以来，百世莫之或改。若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虽尧舜不能以致治也”<sup>111</sup>的观点。如此，才能保证各级官员在执政时不受偏心和自我利益的影响，统治者也能牢牢掌控国家政权。司马光主张严厉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盗贼，所以，即使郭解声望和社会影响力很大，当汉武帝听说“解平生睚眦杀人其众”<sup>112</sup>时，立即“下吏捕治解”<sup>113</sup>，最终下令“族郭解”<sup>114</sup>，江湖规矩到头来还是屈从于国家法规。

## 五、总结

<sup>108</sup> 王威宣：《论司马光的政治法律思想》，《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35页。

<sup>109</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6页。

<sup>110</sup> [北宋]司马光撰：《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349页。

<sup>111</sup> [北宋]司马光著：《司马温公文集·乞不贷故斗杀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sup>112</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5页。

<sup>113</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5页。

<sup>114</sup>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5页。

司马迁与司马光和班固的游侠思想是截然不同、针锋相对的。前者表示，游侠虽不轨于“正义”，然“私义”可嘉。<sup>115</sup>司马迁站在游侠的立场上论述游侠，认为游侠的侠义行为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给予他们很高的评价。而后者表示，汉朝诛郭解是维护封建礼教与道义，反对游侠破坏“正道”的正确做法，具有鲜明的阶级等级色彩<sup>116</sup>。司马光和班固站在大一统封建国家专制皇权的角度进行论述，是为统治者立法。他们始终坚信游侠群体的出现会破坏社会秩序，对皇权造成严重威胁。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与他们的生平经历、家族文化的熏陶、政治观念、学术背景、思想倾向、所处的时代背景等因素的不同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司马光游侠思想的背后也折射出了他所倡导的治国理政观念，有构建基本人伦关系、礼乐教化、尊君、养百姓、赏罚分明等思想。总而言之，司马光以君权为中心，强调礼法并用，主张遵礼而不怀私，是封建专制和皇权笼罩下建立等级层次鲜明的体制化秩序的坚决支持者和维护者。司马光的伦理观、礼法并用等思想不仅成为了深度研究宋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需要，而且也有助于当今国家与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

[作者：胡辰欣，兰州大学萃英学院 2019 级人文萃英班本科生。]

【指导老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炯炯副教授

<sup>115</sup> 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丛论》，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8页。

<sup>116</sup> 杨晓辰：《司马光道德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9年，第1页。